

知識分子未來的動向與職責

文/王汎森（中央研究院副院長、余紀忠文教基金會公與義小組）



◆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王汎森。

從第一屆「公與義系列研討會」開始舉辦以來，我便是發起人之一，此後在歷次會議中，因余範英女士的鼓舞與催促，也都有或多或少的參與。在我看來，以「公與義系列研討會」來追念余紀忠先生是一件再恰當不過的事，因為與會者和余先生之間皆有一個共通之處，即知識分子對時代的關懷與批判。

批判時代 建設家園

余紀忠先生曾就讀於南京中央大學歷史系，後入英國倫敦政經學院，繼而從軍、辦報，代表了辛亥革命前後出生的那一代人，想要參與時代、批判時代、並且進一步塑造時代的知識分子典型。而「公與義」這個論壇的

參與者，則代表一群當代讀書人在過去若干年來關懷時代、批判時代，並且努力希望形塑一個公平且正義的社會。兩者在實際行動與議論方面，當然會有出入，所產生的實際影響力也有不同，但是在以「知識分子」自期，希望盡自己的力量為社會做事的想法卻是一致的。

如今，二、三十年過去了，我也到了兩鬢飛霜之年，迴思當年那些熱情的談論，內心依然波動不已。當要我寫序時，雖因自忖份量不夠一再推辭，但在這個知識分子文化急遽沒落的時代，除了回顧余紀忠先生一生的關懷與志業外，我們還應當鄭重地思考知識分子文化未來的動向與職責。

堅持知識分子的關懷

黃榮村：

第一，是有關台灣的出路，談到全球、區域、兩岸以及台灣本身的外在、跟內在壓力，接下來該怎麼調適，包括順勢而轉等機制在內。在有關政經、產業、生活方式、制度文化上面，強調應該突顯出台灣領域及特色，才有自我療癒的功能。政府、知識分子、媒體、民間機制所扮演的角色，應了解時代變化的特質，找出具有問題意識的公共性問題來解決，注意過程並提升公共政策的品質。

第二，有效率及有聲望的政府領導，跟兩岸事務的經營成效，不能只執一端。台灣的良治跟兩岸之間求同存異有很大關聯，這是重要的相互依賴、相互支援。

第三，台灣應尋找特有文化、生活、文學、語文、網路等，政府可協助不同特色文化互相支援，應走入華人世界或是華文世界。

第四，在國家、社會、兩岸、區域還有政黨、政治等項上，仍有甚多應做之論述與實踐，應在過去的傳統與未來的場景中，往前看，找

出對未來世界的想像，讓台灣保持生命力，提高競爭力。

第五，假設我們都站在余先生的高度上，我們應問台灣該不該有下一步改革，要怎麼做下一波改革？如何體會台灣所面臨的不確定性與邊緣性？要如何在這些限制條件裡面，思考應有的改革？

很多問題也許沒有答案，但如何站在像余先生的高度上來看問題歸納起來大家仍有焦慮，只因為大家心中仍有知識分子的關懷與理念。